

【主持人语】湖南湘潭作家李运启先生的长篇小说《迷途》，定位于“知识分子小说”，以一个艾滋病人的自白的形式，讲述了主人公陈文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精神被摧毁、人性被扭曲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一个知识者在丧失了精神信仰之后的心灵痛苦和精神迷茫。本期推出的李运启专辑，特邀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迷途》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以期深化学界对这部颇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异化的现代中国式“反省”

——李运启《迷途》简评

王洁群,张 庆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具有“忏悔录”故事模式的长篇小说《迷途》，它并没有西方意义上“忏悔”，也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反省”，更没有近现代中国那种具有深刻批判性的“反思”。它是异化了的现代中国式“反省”的新标本，呈现出一种去责任、无痛苦、炫耀式的“反省”姿态。

关键词: 李运启;《迷途》;异化;反省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5-0001-04

The Alienation of “Ref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yle

——On Li Yunqi's Novel of Wrong Path

WANG Jiequn, ZHANG 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05,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of Wrong Path that bears the appearance of “confessions” is not actually “confession” in the western fashion, or “reflection” in the sen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r the profound critical “introspection” in the sense of modern Chinese. Instead, it is an alienated refl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tyle which is irresponsible, care-free and conspicuous.

Key words: Li Yunqi; Wrong Path; alienation; reflection

湖南作家李运启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迷途——一个艾滋病人的自述》(以下简称《迷途》)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忏悔录”式的故事。可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西方意义上“忏悔”意识,也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反省”意识,更不是近现代中国那种深刻批判国民劣根与落后文化的“反思”,而是一种拒绝承担自

我责任的“反省”,是异化了的现代中国式“反省”的新标本。

一 去责任的“反省”

小说故事的基本框架是饱经人世风霜的农家子弟陈文秀得了艾滋病,回到乡下等待死亡的来

收稿日期: 2011-07-25

作者简介: 王洁群(1968-),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张庆(1986-),男,河南安阳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临,“漫不经心”、“不时”地“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人生。在事业上,他曾经想当一个将历史“真相”告诉学生的老师,可极左的校长剥夺了他的教学资格;他想做一个认真“打假”的经检干部,可贪腐的上司再不让他参与查案,查案也只是让他成为领导间权力斗争的棋子;他想做一个诚实的商人,可无人买账让他几乎破产。于是他只能送礼拉关系,只能陪玩、拜码头,只能在牛肉中注水放硝酸盐;只能一步步妥协,一步步丧失做人的良知。在感情上,他想守住大学时代纯真的爱情,可政策偏不允许他与丁洁分配在一起;他想对米倩付出真情,对方却已不是处女;他觉得朱小颖很不错,可她却偷看他的日记;他和妻子冯青没什么感觉,却反而结婚生子。于是他只能放浪形骸,与熟悉的同事、初恋情人出轨,与不熟悉的歌厅女、洗浴女上床,一点点沦陷,一点点褪去大学里那个踌躇满志的天之骄子的道德理想。所有这一切的命运,都不是主人公陈文秀个人的主动选择,他基本上都是被逼、无奈,都是外部力量的强加,即便是得艾滋病,也只是一个看似清纯的洗浴女让他放松了警惕,这种“恶疾”太让人防不胜防。因此,他觉得自己不需也不能对这些负责。正如王跃文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陈文秀俨然是这个时代的或者社会的受害者。”^[1]他也乐于扮演这样的“受害者”角色,进而也就可以问心无愧,甚至理直气壮。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虽然不像西方那样拥有历史悠久的、带有浓厚宗教特征的忏悔意识,但很早就有反省传统。在儒家的经典里,孔子要求:“见不贤而内自省”,^[2]曾参强调“吾日三省吾身”,^[3]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君子必自反”,^[4]荀子则要“日叁省乎己”;^[5]道家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6]法家有“自见”、“自胜”等思想;^[7]后世的宋明理学也说:“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8]这些思想对国人的“修身”、“养性”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这种反省最大的特点乃是“求诸身”、“省乎己”,在于反躬自问、自我检讨,主要针对主体个人言行、思想进行反省,强调自我承担与自我完善。可谓传统的中国式反省。

近现代以来,鉴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国人掀起了对制度、文化等外部因素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想潮流,逐渐将反思的矛头从个人身上转移,直指国家制度和传统文化,旨在找到变法图强、革故鼎

新的途径。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进而到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一大批继往开来、引领古老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先驱们,无不深刻地进行着这种沉痛的反思。这种反省,旨在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藉着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制度的参照,反思国家体制、文化传统,形成了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潮,是新的、现代中国式的“反省”。

在文学领域,这种新的“反省”几乎与近现代文学相伴而生。近代“新小说”中,以李伯元、吴趼人的小说为代表的对晚清官场的谴责、批判,对未来中国的畅想;以鲁迅的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中对国民性的揭露、批判,对科学、民主的期盼,对“人”的文学的追求,无不是这种“反省”的反映,表现出了强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艺术力量。

然而,我们也看到,这种现代中国式的“反省”,很容易变味,很容易异化成为推卸自我责任,放任自我沉沦,以“反思”、“反省”的名义,将一切责任推给外部环境,强调是社会、他人制约、压抑、导致了己人生的错误与失败,强调外部的客观环境要为事情的结果负主要责任,自己只是受害者,或者只是看客、旁观者。此可谓异化的现代中国式“反省”。

这种异化的“反省”,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历程中不绝如缕,似乎已构成另类的传统。它在1921年出版的号称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白话小说集的《沉沦》中就已经初见端倪,从小说主人公在蹈海前那句著名的沉痛哀叹中——“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9]——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反省”的典型逻辑:我是受害者!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虽然开启新时期的文学新局面,但却沉溺于揭露时代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压抑”以及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较少追寻更深层的,特别是个人的思想根源。后续的“反思文学”虽然在王蒙、张贤亮、张洁等作家的努力下,对个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有所探索,但整体结论还是时代的责任大于个人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降,新兴的官场小说更是将这种“反省”在反思体制的名义下,将一群被“官场文化”、“潜规则”浸染、扭曲的人物还原为可怜的受害者形象,将这种“反省”的异化特质放大到前所未有的境地。

在这个意义上,《迷途》可以说很好地继续了当

前官场小说里那种由来已久的、异化了的“反省”姿态,并赋予新的特色。小说中主人公的这种“受害者”形象、“控诉”式“忏悔”,这种拒绝责任、归因于他者的“反省”,既与异化了的现代中国式“反省”有深刻的精神一致性,又表现出了自己新的特征,反映了这种“反省”的新变化。

二 无痛化的“反省”

在陈文秀的“反省”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色是其面对死亡的平静与坦然,呈现出一种无痛化的“反省”状态。

古人在谈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时,一般都会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起兴,可见“哀”是死之前一般应有的情绪、情感。郁达夫的《沉沦》、卢新华的《伤痕》等篇什中更满布哀叫、哭诉。然而,在《迷途》中,主人公陈文秀在等待诊断结果时,固然感到“焦虑和痛苦”、“绝望与孤独”;在得知结果那一刻时,也曾经“头脑空白”、“精神恍惚”、“两脚发虚”,但很快就心绪“平静”、“安宁”,即使他只能在“自杀”和在“安静中离开这个世界”里进行选择——他已经无法选择——“活着”,他也没有——更不希望有——“痛苦”和“挣扎”。

陈文秀面对死亡之所以能够“无痛”,之所以能够保持心绪“平静”、“安宁”,按照小说的解释,是因为他“悟”了。小说通过道士“马老师”的口吻指出:“每一个人都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内心的宁静来获得解脱。”“人啊,最大的问题是欲心太重,受的诱惑太多……一个人能不能成大事,靠的不是能力,而是运气。很多人成了大人物,成了大富翁,并不是他的能力多么出众,而是机会把他推了上去。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辈子的。如果你不甘心,便注定只能感到失落和痛苦。人的失落和痛苦都是自己心中产生的一种感受,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你的。”“平常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你看乡下生活了那么多人,这些人安分守己,与世无争,他们有什么宏大的志向没有?他们思考过人生的意义没有?没有。但你能说他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他们一个个都生活得很满足,很幸福。一个人不贪,不争,不受诱惑,就会活得心安理得。”他自己也已经“悟”出:“生命就是安安静静地活着,有意识地活着。”

我们且不去争论“乡下人”是否真的没有宏大的“志向”,是否真的没有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些“大

人物”、“大富翁”是否真的只是凭借“机会”和“运气”而成就大事。陈文秀想告诉人们的“大道”是:无欲、无争、无思考,人生就会幸福;不追求、没能力、完全听命于命运的安排,安心等待运气的到来,生活就会平静。他向人们呼吁的是行动上的听天由命,无欲无求;思想上的安分守己,心如止水。为了“无痛”,甚至害怕“有痛”,陈文秀面向死亡而展开的“反省”,获得的却是“不思考”,却是直接对“思考”和“追求”的取消;由“反省”开始,到取消“反省”结束,可谓“身”未死而“心”先死;当然,他也只有“心”先死,“身”才能“无痛”。

其实,综观整个小说,真正让陈文秀“无痛”的,并不是寺庙高僧大德的启示、道观得道仙师的点拨,而是他本身那种日益深陷其中的无目的、无方向、无操守、无反思,只有欲望、冲动、本能的人生。曾几何时,陈文秀也是有志青年,一腔热血,满怀抱负:当教师,壮志难酬,痛苦彷徨;谈恋爱,真情不再,郁闷失望。但随着世易时移,他棱角日渐消磨,心灰意冷,随波逐流,开始了他的“四无”人生,沉溺在放纵、堕落、欺骗中洋洋自得,甘之若饴。如果不是时运不济,命中艾滋,他的人生本就无痛,无需反省。或者说,在世事翻覆中,他的心灵早就老茧重叠,无法感知痛苦,也不愿再体验痛苦。“反省”,对他来说纯属多余,如果命运要用诸如“艾滋”这样的绝症硬逼着他“反省”,他也只选择那种过滤掉痛苦,抽去了实质,可以让他坦然接受的无痛“反省”,既无须触及个人灵魂,也无须——更无法——撼动乖谬的现实。

实质上,陈文秀们早已失去了“反省”机能。他所谓的“反省”,只能是一种苍白、僵硬的态度。这种姿态性的“反省”也必然是无痛、无用的。

三 炫耀式的“反省”

在陈文秀的叙述中,除了对死亡的无痛化“反省”外,还令我们惊诧的是其叙述中对走向死亡的人生过程的炫耀性展示。小说中到处充满着叙述的愉悦,它使整个故事演化为一种炫耀式的“反省”。这是《迷途》中的“反省”呈现出的另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质。

小说中,事业上的不断地受害,去职,赔本,并没有让陈文秀山穷水尽,反而促使他越爬越高,越爬越富,越来越有能耐,越来越风生水起。感情上不断地失恋、离婚、被抛弃并没有让主人公孤单、寂

寞、坐拥愁城,反而解除了他的道德枷锁,将更多的美色奉献到他面前,任他予取予求。如果不是死亡的大限不请自来,他应该是今天电视上、报纸上典型的成功人士,拥有万贯家财,怀抱温柔美女,时不时还做一点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风光无限、令人称羨。

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对贵重物品的消费之所以是“炫耀性消费”,就是因为它是一种通过对一般人难以(或不许)占有之物的过度消费、甚至浪费,从而“博取荣誉”、确认“身份”的手段。^[10]陈文秀的“反省”,之所以会让人感觉是炫耀式的,首先是其洋溢在叙述话语字里行间的对金钱、手段、女色的夸耀几乎随处可见:吃掉两万三的酒席、轻易出借两万给朋友、输赢一万多元的牌局、送一万元给困难职员母亲治病的善心、随手摆平市级领导和退货难题、让女人一连好几次高潮等等,不一而足。而且,小说对陈文秀的金钱、能力、智力上的优势不遗余力的展示,目的就在于塑造其心理上的优越感、成就感,确认陈文秀作为成功人士、“猛男”的地位,博取读者的羨慕,基本如实地呈现了对现实中的权力逻辑、财富逻辑、情爱逻辑的高度认同,丝毫没有对不义之财、不伦之情、不法之事的批判、反思,难免让读者觉得炫耀有余而“反省”不足。

其次,小说对陈文秀染上艾滋这一悲剧性事件的叙述,一再强调它只是一次偶然的“套子滑出”事件,如果不是意外,陈文秀依然会成功着、莺歌燕舞着。死亡的来临,与他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他不需为他长期的沉沦于物欲、情欲负责,他只是生不逢时、病不逢时而已。如果实在要严格检讨,他也只需为其不小心、太大意而负责,正如很多官场小说中贪官被抓,只埋怨自己太不老练,太不成熟一样。所以,即便陈文秀需要“反省”,也只需到反省到“意外”、“不小心”就可以画上休止符,无需触动、否认那些令人“艳羨”的人生“美事”。

总之,《迷途》这本以“自述”为题的小说,穿着“记忆”的外衣,操着“忏悔”的口音,进行着去责任、

无痛化、炫耀式的“反省”,延续并发展着一种由来已久的、异化了的现代中国式“反省”传统。这种新式的“反省”在作品中延续并呈现新的特征,而且让人深以为然,甚至觉得它特别真实可信,这就使得该小说在中国的“反省”思想历程中,具备了标本的意义。哈布瓦赫告诉我们,“记忆”往往不是对历史的真实摹写,常常是是社会意识框架对经历的重新建构。^[11]在这本以“记忆”为号召的小说中,那些被叙述的、经过过滤处理的生活细节、人生经验也许不过如此,而那些隐藏在叙述背后,能够反映当代社会特征的“逻辑”、“社会框架”可能更值得人们反省。

参考文献:

- [1] 王跃文. 迷途·序[M]//李运启. 迷途——一个艾滋病人的自述[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
- [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里仁[M]. 北京:中华书局,1983:73.
- [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学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48.
- [4]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78,298.
- [5] 方孝博. 荀子选·劝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
- [6] 朱谦之. 老子校释:第三十三章[M]. 北京:中华书局,1984:133-134.
- [7]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喻老[M]. 北京:中华书局,1998:169-170.
- [8] 程颢,程颐.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16.
- [9] 郁达夫. 郁达夫小说全编[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50.
- [10]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0.
-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责任编辑:黄声波